

《潜江县志》故宫本版本探疑

张学军

提要：对比刻本的版式组成，《潜江县志》故宫本并非康熙三十三年传经书院的原刻本，而是抄本；对讳字的避与不避和文本内容的变化可以看出，抄写的时间是在乾隆十九年之后至嘉庆之前，即1754—1795年；从故宫本出现的时间和文字格式、内容判断，抄本的底本是康熙三十三年传经书院原刊本。限于抄本的性质，故宫本流传不广，其遴选资料和编纂方志的思想对后来的影响是有限的。

关键词：潜江 地方志 抄本

引子

刻本亦称刊本、椠本、镌本，指雕版印刷而成的书本。^①康熙《潜江县志》的刻本有两个，一是康熙三十三年（1694）传经书院刻本，为原刊本，二是光绪五年（1879）传经书院刻本，为重刊本（见图1）^②。故宫博物院把院藏的《潜江县志》作为原刊本收入《故宫珍本丛刊》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，2001年由海南出版社出版（后文简称为“故宫本”）。故宫本在丛书《卷首》的分册总目录里介绍本书：“[康熙] 潜江县志二十卷首一卷，清刘焕修，朱载震纂，清康熙三十三年刻本。”^③但故宫本在表现形式上与原刊本有很大的不同，与通常的刻本也有较大差异，本文试就此比较分析，并对故宫本和两个刻本的关系进行探讨。



图1 原刊本（左）和重刊本（右）的书名页

说明：原刊本底图来源为《潜江县志》，康熙三十三年刻本，国家图书馆藏；重刊本底图来源为《潜江县志》，湖北人民出版社，2020年影印本

^① 参见李致忠：《古书版本鉴定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97年，第90页。

^② 参见刘焕修，朱载震纂：《潜江县志》，湖北人民出版社，2020年影印本，前言第1页。

^③ 故宫博物院编：《卷首》，“故宫珍本丛刊”，海南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46页。

一 从表现形式上看故宫本与刻本的差异

1. 故宫本没有完整的刻本版式

故宫本文本的排列是半页9行，每行21字，文字由上向下竖排，每行由右向左排列，大字单行，小字双行，这与当时通行的刻本的形式没有区别。但是故宫本没有版框（边栏）、界行（栏线）和版心（中缝），没有版心也就没有鱼尾、象鼻、书名、卷数和页码，这又与当时通行的刻本结构不一样。

受人力限制，稿本和抄本的数量通常很少，没有卷数和页码，抄写完毕之后整理起来即使有不便，也不算很麻烦。但刻本就不同了，刻本印刷完毕之后，成千上万的纸页要整理装订成册，没有卷数和页码会带来混乱。至清朝时，刻版印刷已经盛行，无论是从降低成本还是提高效率上说，按照固定的流程和格式进行雕刻出版都是最优先，故宫本没有遵从这些格式。

由于缺少页码的识别，故宫博物院影印出版时就出现了书页排列上的混乱，如第42页至第43页、第156页至第158页、第199页至第202页，有页序上的错置，第68页和第70页、第69页和71页（见图2），有书页的重复。清代雕版印刷工艺已经很成熟，如果是刻本，这些因格式缺失带来的问题很容易避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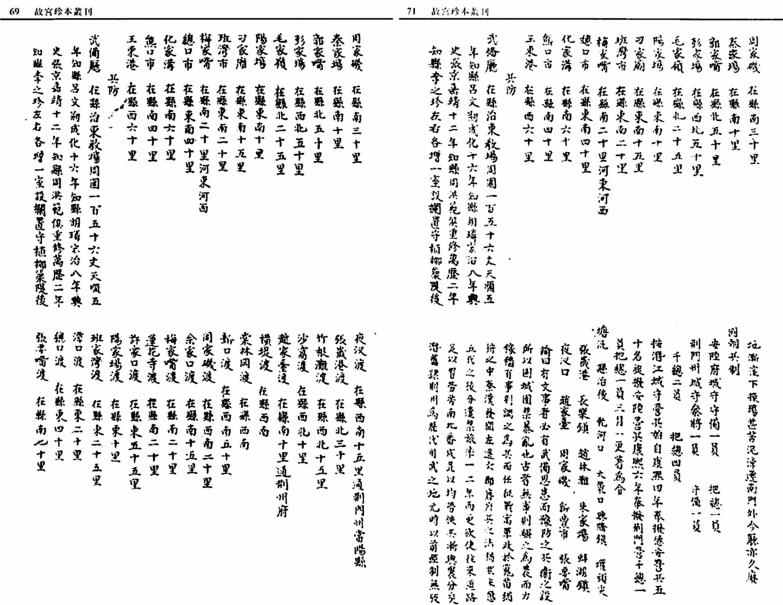


图2 缺少页码信息致故宫本页面重复

2. 故宫本有多种不同的书写笔迹

故宫本在影印出版时，把两页合为一面排版，为节约纸张，上一卷结束，下面如有空白，会接着印下一卷，两卷同时出现在一个页面中，不同字迹的对比非常显眼。以第135页为例（见图3），上半页为卷8的结尾，下半页为卷9的开头，卷8的单个字形较小，笔画收束，为保持每行21字、半页9行的版式安排，字距和行距显得疏阔；卷9的单个字形较大，笔画舒展，字距和行距显得促狭。第190页则相反，上半页是卷10的结尾，各字排列紧凑，而下半页卷11的开头则略显疏落。

从字体风格上看，第5卷、第6卷、第9卷、第10卷、第16卷呈现出典型的颜体特征，结体匀称；第15卷、第17卷受魏碑影响，笔画粗豪；第4卷有明显的欧体特点，中宫紧收；其他各卷笔画上虽有颜体影响，结体上丰富多变，不求稳定。书风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，可以判断至少有4人的书写。

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閑其多寡煩炎隨民之有田者
稅之而不復視其下中二人之政君子羞稱馬唐貞觀
定租庸調法孟氏所云粟米布縷力役三征是也宋之
經總制錢以及告緝征榷其名不一而悉謂之賦明初
固仍元制賦稅輕重弗倫潛受漢委土惟塗泥厥田惟
下中地漸滯淤變遷靡常竒之經界明辨者不踰時而
肥瘠蒼澑飽豪猾以魚肉孱弱不均之害孰甚于自明
萬歷間朱侯清丈均賦利賴至今我
國混一區宇稅糧徭役有定制尤屢沛

而味亦無大異曩會有以充中秋餽遺者後竟者爲
成例計凡應餽之處自百枝以至數百枝始猶價買
于市鎮既則減取于各境甚且不問其人之種瓜與
否按戶減取胥役恣意索求以飽其私橐寧知在上
者直以徵物視之往往卻而不收而民之吏胥已莫
可勝言矣邵陽王侯一旦深知其害痛爲懲革嗣守
此土者復惑于胥役之請民之害也滋甚劉侯煥力
除陋規禁沿村採買之役民咸德之夫至人不貴異
物沉未必異乎述土物之宜上之天府非其良者勿

图 3 故宫本各卷字迹不同

从宋朝到清末，刻本印刷字体主要有两大类：一是唐宋名家字体，以颜体字、欧体字、柳体字、赵体字为主；二是印刷体，主要是宋体以及仿宋体。^① 其字形之长方、笔画之粗细受时代、风气和地域的影响各有不同，但同一本书中，字体是统一的，不会有过多的变化。《潜江县志》光绪重刊本即属第二类，以长体的仿宋来排印，清秀雅致，便于阅读。故宫本显然不是这种。会不会是第一类，即所谓的写刻本，先请名家书写，再照此刻版付印呢？《潜江县志》有十多万人，名家书写，润笔会是一个巨大的数目，照此雕刻，比宋体字更费时费力，成本亦会大幅增加。潜江并非繁华富庶之地，各种灾害频繁，“民无百年恒产，而家无屡世素封”^②，从历史上看，数百年间，县志才得二刻。如果是写刻本，必得竭全县之力，兴师动众，后世文献中将留下浓墨重彩的记录，但我们并未从任何文献资料中得到查证。从《潜江县志》编纂出版的目的来看，注重的是实用价值，名家书法的审美价值是无暇顾及的。综合考虑，可以将写刻本的可能性排除。

3. 故宫本有部分文字修改

故宫本中有少量的文字修改痕迹，亦可作为并非刻本的佐证。以第 255 页为例（见图 4），左数第 3 列的“入”字，左数第 6 列和第 7 列的两个“祜”字，右数第 6 列的“酬”字、第 3 列的“初”字，笔画较他字更粗。这个与众不同的特征，仅为个别笔画和个别字形具有，邻笔和邻字并不受影响，可见不是付印时刷墨不均形成的滞墨，而是意识到写错临时所作的更改，试图掩盖先写的笔画，虽经遮掩，其下细小的笔画仍隐约可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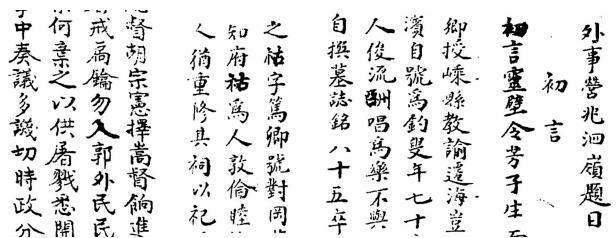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4 故宫本书写修改痕迹

^① 参见李致忠：《古书版本鉴定》，第 111—121 页。

^② 刘焕：《潜江县志》，湖北人民出版社，第 58 页。

二 从避讳字上看故宫本出现的时间

经过以上的比较分析，笔者推定故宫本不是刻本，而是稿本或抄本，那么，该本出现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？下面试从避讳字的角度作一推断。

封建时代为了维护等级制度的尊严，说话写文章时遇到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，必须用其他方法以避之，不直接说出或写出，称为避讳。避讳常用之法有三：曰改字，曰空字，曰缺笔。^①清朝避讳分三个阶段：避讳自康熙始；雍乾之世，避讳至严；道咸而后，讳例渐宽。^②下面对几个讳字进行分析：

1. “玄”字

清圣祖名“玄烨”，年号康熙。康熙崇尚儒学，重视家庭伦理，他在位 61 年，清朝皇室人名的汉化基本完成，又实行了“敬避御讳”制度，如“玄武门”改称“神武门”，即为避康熙的名讳。^③“玄”字在故宫本中大多易为“元”字，如“太宗贞观二年从房元龄议，别祀周公，升孔子为先圣，坐仍旧”^④。房元龄即房玄龄，唐朝初年名相。还有“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加谥孔子为元圣文宣王”^⑤。元圣文宣王实为玄圣文宣王。《知县王又旦传经书院约》其七习乐约：“夫戴逵之琴导德宣情，傅元之筝推故引新，马融之笛通灵感物。”^⑥傅元即傅玄，魏晋时期名臣，他博学多识，文采出众，通晓乐律，写有《琴赋序》。故宫本中也有把“玄”写作“玄”的，如“帝居伊迩，二圣玄宫在望，金玉相辉”^⑦。玄宫即玄宫，此处指帝王的坟墓。还有略过不写的，如“如鹤来翔，如五色雁集，如殿上感钟音，寝中见烛光”^⑧。“鹤”前直接少写一个“玄”字。

2. “胤”字

清世宗名“胤禛”，年号雍正。雍正继统后，下达圣旨：“朕曾奏闻皇太后，诸王阿哥名上一字，著改为‘允’字。”^⑨他的兄弟如“胤祕”改为“允祕”，“胤礼”改为“允礼”等，皇亲尚且需要避讳，民间更不必说。故宫本人名中出现的“胤”均改为了“允”字形，如“曹胤昌”^⑩、“姚胤选”^⑪、“张胤”^⑫。到了光绪五年县志重刻时，讳例虽宽，余威犹在，“曹胤昌”和“姚胤选”的“胤”写成缺失首画竖撇的字形，“张胤”写成了“张胤”。

3. “丘”字

孔子名“丘”。清以前有过对“丘”的避讳，但遵守并不严格。清世祖顺治二年（1645）封谥孔为“至圣先师”，雍正年间再次作出避讳规定，并得到严格执行。^⑬光绪重刊本中，“丘”

^① 参见陈垣：《史讳举例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，1997 年，第 1 页。

^② 参见陈垣：《史讳举例》，第 122 页。

^③ 参见王彦坤：《历代避讳字汇典》，中州古籍出版社，1997 年，第 514 页。

^④ 参见故宫博物院编：“故宫珍本丛刊”，第 73 页。

^⑤ 参见故宫博物院编：“故宫珍本丛刊”，第 73 页。

^⑥ 参见故宫博物院编：“故宫珍本丛刊”，第 92 页。

^⑦ 参见故宫博物院编：“故宫珍本丛刊”，第 103 页。

^⑧ 参见故宫博物院编：“故宫珍本丛刊”，第 100 页。

^⑨ 《清实录》第 7 册，《世宗实录（一）》卷 2，中华书局影印本，1985 年，第 62 页。

^⑩ 参见故宫博物院编：“故宫珍本丛刊”，第 121 页。

^⑪ 参见故宫博物院编：“故宫珍本丛刊”，第 221 页。

^⑫ 参见故宫博物院编：“故宫珍本丛刊”，第 249 页。

^⑬ 参见王彦坤：《历代避讳字汇典》，第 353 页。

字出现了30余处，均写作“邱”，在故宫本中，与它对应的这些字大多写作“埶”或“邱”。有两处比较特别，一处写作“兵”^①，故意多加两点；一处写作“正”^②，与“丘”的常用字形均有区别。写作“丘”形没有避讳的仅一处，出现在故宫本第73页的双行小字位置。笔者相信书写的人是一直讲求避讳的，唯一的这处犯讳应是疏忽造成的遗漏。

4. “弘”字，“历”字

清高宗名“弘历”，年号乾隆。故宫本中“弘”均写作“宏”，如刘肇国传有“本朝顺治二年乙酉授宏文院检讨”^③，宏文院即弘文院。“历”全部写作“歷”或“歷”，不写作“曆”以避讳。如“萬歷”^④，为明神宗年号，“赤歷”^⑤，为上级财政机关稽核各州县官府钱粮的册籍。

5. “琰”字，“宁”字

清仁宗名“颙琰”，年号嘉庆；清宣宗名“旻宁”，年号道光。“琰”作为人名用字，县志卷17人物志中出现一处，我们把这处的两个不同版本对照来看（见图5）：

何瓚，长乐乡人。事亲能养志。父病革，呼瓚至，不言。瓚泣问曰：“父不言者，得非为庶母及幼弟琰乎？”父倾之。父歿，瓚事庶母益恭谨不衰，与弟琰同居终身。（《万历旧志》）

——故宫本⑥

何瓚，长乐乡人。事亲能养志。父病革，呼瓚至，不言。瓚泣问曰：“父不言者，得非为庶母及幼弟乎？”父倾之。父歿，瓚事庶母益恭谨不衰，与弟同居终身。（弟名琰。《万历旧志》）

——光绪重刊本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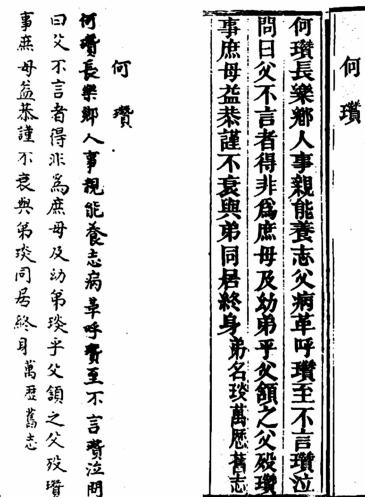


图5 故宫本（左）和重刊本（右）的《何瓚传》

① 参见故宫博物院编：“故宫珍本丛刊”，第76页。

② 参见故宫博物院编：“故宫珍本丛刊”，第96页。

③ 参见故宫博物院编：“故宫珍本丛刊”，第270页。

④ 参见故宫博物院编：“故宫珍本丛刊”，第3页。

⑤ 参见故宫博物院编：“故宫珍本丛刊”，第45页。

⑥ 参见故宫博物院编：“故宫珍本丛刊”，第281—282页。

⑦ 刘焕：《潜江县志》，湖北人民出版社，第308页。

故宫本是不讲避讳的，所以在正文中无所顾忌，两次写出“琰”字。重刊本重刻在光绪五年，需要讲求避讳，为免招祸端，把正文中的“琰”全部删去，仅在段后用小字补上人名，字形也作了改动，“琰”写成“琰”。

“宁”字通用字形为“寧”，故宫本中大多为通用字形，也有个别用“寧”“寧”或“寧”，字形的改变应该是适应书写的需要，因该字笔画较多，字形太小时，笔画易重叠在一起而难以辨认，故借用草书的写法，把邻近易混笔画合并书写，并非有意避讳。光绪重刊本中的“宁”则不然，写作“寧”“寧”居多，个别写作“寧”或“寧”，没有写作通用字形“寧”的。

从以上讳字的避（“玄”“胤”“丘”“弘”“历”）与不避（“琰”“宁”）来看，故宫本的出现时间在嘉庆之前的乾隆时期（1736—1795）。故宫本对原刊本的附录的诗文作了删减和补充，补充的资料提到的最晚时间出现在《修筑沙窝骑马大月堤碑记》：“岁癸酉季秋之初，汉水泛溢，潜境沙窝堤塗冲嘴崩溃数百丈。迨半月后大水方退，急议修筑。……自冬徂春，阅四月而工乃竣。”^① 癸酉是乾隆十八年（1753），其第二年即乾隆十九年，因此，我们可以把故宫本出现的时间段再缩短到1754至1795年之间。

三 故宫本与两个刻本的关系

1. 从格式上看，故宫本是抄本不是稿本

因光绪重刊本更为流行，我们拿重刊本与故宫本作比较，发现它们在文字的排版上几乎相同。以重刊本卷4的开头为例，首行标明卷数“潜江县志卷之四”，顶格不留空，次行标明作者“知县刘焕纂修”，上空1格，单名与姓之间空1格，第3行写项目名称“建置志”和细目概列，项目名称上空2格，细目在项目名称后空1格，以双行小字排，细目之间各空1格。接下来的总说均以顶格排，再后详述细目，细目名称上空3格。细目分条详述时，各条首行顶格排，次行起上空1格，如有附录诗文，则先录标题，空1格后录内容，每行均上空1格。为了辅助文字进行清晰表达，编修者对格式有细致的安排，其他各卷也是如此。拿故宫本与重刊本对照，发现格式是一致的（见图6），甚至各行的首尾文字都是一样的，难怪故宫本的编印者会把它定为刻本了。这种雷同的格式也提示我们，故宫本不是另起炉灶，在两个刻本之外重新起稿写出一本全新县志，而是对已有刻本的摹抄，换言之，故宫本不是稿本，而是抄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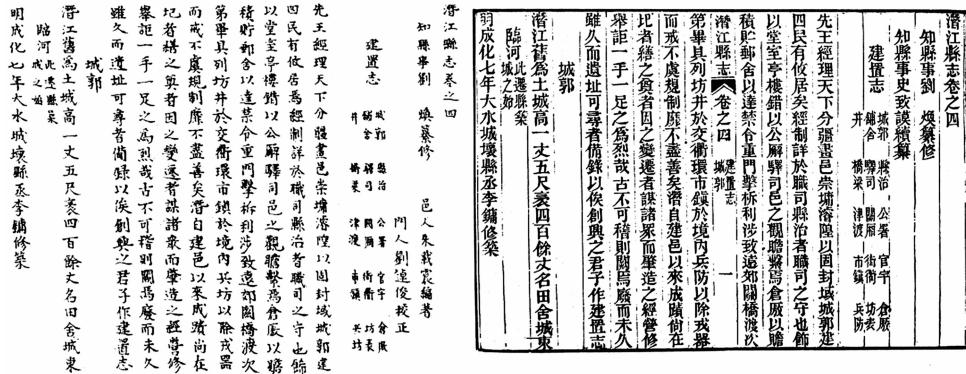


图6 故宫本沿用旧刊本格式

^① 刘焕：《潜江县志》，第219页。

2. 故宫抄本的底本是原刊本

潜江县志在光绪年间重刊时，原刊本的刻板历经 180 余年，没有完好保存，但印本和部分刻板留传下来，重刊时基本原样沿用。原刊本在卷首标明卷数之后，写上了主要参与者的姓名和所为，“知县事刘焕纂修，邑人朱载震编著，门人刘连俊（莫扈储）校正”，重刊本改为“知县事刘焕纂修，知县事史致漠续纂”。故宫本没有这些改动和缺失，保持了原刻的基本面貌，故宫本出现的时间也早于光绪重刊本，因此，故宫本作为抄本，其抄写的底本是初刻本。

3. 从内容上看，故宫本没有增加原创性的文本

故宫本和原刊本在内容上不完全相同，主要体现在故宫本对原刊本作了删减和补充。删减的大部分是卷 5 至卷 20 里抄录的诗文，计约 49 首（组、篇），少部分是叙述说明文字，如卷 9 别墅“网台”的介绍，卷 10 康熙八年八月、康熙十九年五月的“河防”情况，卷 14 的“召试”说明等。

增加的内容不多，有 3 类：一是诗文，如卷 5 “传经书院”后附录杜汝愚《重修传经书院记》，卷 10 “分区总目”后附录杜汝愚《请将潜境仙人古堤照荆门州一例动项兴修禀各宪启》、曹銮《重修沙窝骑马堤碑记》、杜汝愚《修筑沙窝骑马大月堤碑记》、朱抚《新筑沙窝大月堤告成纪事二十四韵》等。二是题名，如卷 11 知县、主簿、典史、教谕、训导题名，卷 13 荐辟、进士、乡举、贡士题名，卷 14 武科题名等，都有补充。三是小传，如卷 16 增补张连璧传，卷 18 增补朱氏传等。

删减的内容自不必说，增加的内容，前两类诗文和题名是整理康熙三十三年之后至嘉庆之前的文献资料，只需要遴选甄别，分别抄录即可，需要原创书写的是第三类小传，但这部分数量非常少，仅有两处，不过 500 字左右。故宫本基本没有增加原创性的文本，其性质的确是抄本，而不是稿本。

4. 故宫本对后来的影响有限

故宫本对原刊本进行了删补，是资料遴选、方志写作上不同的思想原则的体现，但这些思想并没有得到延续，至光绪五年重刻《潜江县志》时，其重刻底本选择的是原刊本，而不是故宫本。故宫本删减的内容，在重刊本都得到保留，故宫本增补的内容，除卷 10 末附录诗文和卷 16 张连璧传外，没有得到采用。抄本毕竟数量太少，读者有限，大大影响了它的传播范围，故宫本对后来的影响是极为有限的。

结语

综上所述，可以得出结论，对比刻本的版式组成，故宫本并非康熙三十三年传经书院的原刻本，而是抄本；对讳字的避与不避和内容的变化可以看出，抄写的时间是在乾隆十九年（1755）以后至嘉庆之前，即 1754—1795 年；从故宫本出现时间和文字内容判断，抄本的底本是康熙三十三年传经书院原刊本。

得现代数字化之便利，许多古籍在互联网上复现流传。古籍馆网站建立数据库，收录 1949 年以前 30 多万种古籍文献资料，其中包括故宫本的扫描件，在检索目录里有说明：“潜江县志 [康熙]。二十卷首一卷。（清）刘焕修，（清）朱载震纂。抄本。地理类。”^① 亦断为抄本。

（作者单位：江汉艺术职业学院）

本文责编：杨卓轩

^① 古籍馆网站，<https://www.gujiguan.com>。